

黑色幽默:

弄假成真的民国愚人节新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1946年的愚人节那天,《上海时报》与《辛报》“报道”的两则“独家新闻”竟搞得国民党上海当局手忙脚乱。更有趣的是,这两则杜撰出来的新闻,竟然随后都变成现实了,堪称新闻史上的黑色幽默。

1946年的4月1日,也就是愚人节当天,《上海时报》刊载了一则“独家新闻”,大标题是《冯玉祥昨飞抵沪》,副标题是《准备出国赴美考察水利郭沫若史良亦同机来沪》,“记者”以现场采访的口吻,写实感很强,此消息中还煞有介事地介绍了冯玉祥将军一首偶成的新诗:

“东方巴黎十年别,  
市民依旧在哭泣。  
但愿美国回来后,  
人人都有饱饭吃。”

诗中所谓“东方巴黎”是指上海而言。

这则假新闻由于编造得合情合理,所以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少读者信以为真,纷纷打电话给《上海时报》编辑部……冯玉祥将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站在爱国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无情地揭露蒋介石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政策,在武汉群众集会上,冯玉祥将军号召民众坚持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抗日战争胜利后,冯玉祥将军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并与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而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暗中监视。

如今《上海时报》“独家新闻”突然

宣布《冯玉祥昨飞抵沪》,而且还要“出国考察”的消息,而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竟被蒙在鼓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在上海的大小特务就分头四处打听,并寻找冯玉祥的踪影。最后总算搞清楚,4月1日这天是愚人节,这则新闻是给上海有关当局开了一个大玩笑。特务机构虽然对《上海时报》十分恼火,但既是发生在愚人节,亦只好一笑置之。可谁也不曾料到,不久,冯玉祥将军果真“飞抵上海”,并被“迫”“出国赴美考察水利”,假新闻成了真预言!

上海当时还有一份《辛报》,是由姚苏凤创办的,从发起到终结,时断时续,前后近13年。该报1936年6月1日创刊,1937年11月13日停刊,1945年9月3日复刊,1946年8月31日又停,1948年8月28日再复刊,1949年5月12日终刊。《辛报》在1946年4月1日愚人节当天,也刊登一则“独家新闻”,标题是《姜公美今日枪决》。

姜公美何许人也?

姜公美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显赫一时”、红得发紫的人物,国民党上海宪兵队队长,是个杀人毫不眨眼的屠夫,他来沪早,下手快,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接收到不少产业。已故头号汉奸汪精卫的豪宅和汽车就是被他捷足先得,以致后来者与他发生争执。他与不少大员既结缘又结怨,趁机大肆贪污、侵吞了大量不义之财,因分赃不均,被人告发,于1945年10月14日晚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

当时姜公美贪污案由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陆军总部和军风纪巡视团三方会审,陆军总部高参李申之担任审判长。1946年2月10日李申之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公然宣布姜公美无罪,听众哗然。但过了几天,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声称姜公美巨贪案的主审机关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目前审判尚未结束,陆军总部高参李申之擅自判决不当,将报请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审核。就在姜公美命运莫测、凶吉难定之际,《辛报》4月1日“独家新闻”突然报道《姜公美今日枪决》,使不少善良的读者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有的还特意为之放鞭炮“送瘟神”。这当然使国民党上海有关当局处境十分尴尬。

《姜公美今日枪决》是《辛报》刊发的假新闻,愚人节的杰作而已。5月28日,姜公美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没收赃款赃物及其所有私人财产,此案就此了结。

但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事情后来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到了10月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贴出了“关于对大贪污犯姜公美执行枪决”的布告,百姓看后无不拍手称快。11月6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姜公美从提篮桥监狱提出,押到公园刑场执行了枪决。

抗战胜利后接收时,“接收大员”、宪兵队长姜公美下手快,抢了“汪公馆”(原汪精卫家)内当时堪称上海最好的一辆豪华轿车。淞沪警备总司令李及兰来迟了一步,便要姜公美把轿

车交出来,姜拒不买账。极为可笑的是,这次枪毙姜公美,当时与姜公美争车的李及兰竟是监斩官。

假“新闻”《姜公美今日枪决》竟然成了现实,无非是日子提前了数月而已,可谓未卜先知。

姜公美舞弊案终于尘埃落定。其时舆论认为这“无非是借人头压众怒”,“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演出了一幕幕“五子登科”(五子指位子、房子、金子、车子、女子)的丑剧。短短时间内,就接管各类房屋3939幢。其实应接收的敌、伪、逆产房屋远不止此数。不少敌、伪、逆产被接收大员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有意放走。如大汉奸陈群畏罪自杀后,大量房地产和金银首饰落到家属手中,几位姨太太四处活动行贿,与军统特务勾搭,多数房地产被放走;经济汉奸、号称“煤业大王”的徐贵生的几百幢房屋,以其子徐思良及良华地产公司名义隐匿;日伪卷烟统制委员会主席丁厚卿的几百幢房屋和伪警察局局长卢英在崇德路的大批房屋,都被其家属通过行贿、化名隐匿;曾入日本籍的汉奸司马聘三,本人为日军推销军票,搜括重要物资,其子参加日军屠杀中国人民。他在上海购有淮海中路上海新村部分房屋和靖江路(今桃江路)大花园洋房和南徐公寓等。他与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有勾结,仅凭张的一封信,便逍遥法外。以上被隐匿的产业,在解放后均被人民政府一一查处。(据新华网)

长征红军抢渡湘江 陈云一封急信曾救一个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陈云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平生第一次在军队任职的陈云,以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能力,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率领部队渡过湘江,与红八军团实行整编,在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的注意,为此后光辉的革命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从未在部队担任过任何职务,对红军情况不熟悉,更无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陈云以高度的党性,精神抖擞地明确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军团任职的仅陈云一人,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行军。与陈云同时分别到红八、红九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凯丰(何克

全),当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前卫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迅速抢渡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过河点,拼死抵抗国民党的中央“追剿军”和从广西方面赶来的桂军。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以致行动缓慢,大部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天上敌机肆无忌惮地轮番轰炸扫射,地上是敌军密集的炮火,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30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勉强渡过湘江。然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两侧国民党军开始急速向湘江合拢,红五军团大部分仍滞留于东岸与敌激战,若再不抢渡湘江,将会遭到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由于军团部与师部的通信联络中断,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写信派人火速送给红十三师师长陈

伯钧,信中指出:“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当天深夜12时许,陈伯钧在石塘圩接到陈云的信时,红十三师距江边还有90里,且部队打了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指战员又饥又饿,兼之未睡觉,可以说疲困到了极点。但和陈云一样深知兵贵神速的陈伯钧连饭都来不及吃,立即组织部队执行陈云的指示,连夜跑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军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在几小时后的12月1日中午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全部被敌军占领,被阻于湘江东岸地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霖林及大部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红军在湘江东岸一星期的激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十三师能渡过湘江,与陈云在危急时刻所下的“最大的决心”、所送的这封“十万火急信”生死攸关。

在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过江的1000余人,也陷于一片混乱状况之中。为了让中央及时了解这一情况,陈云会同李卓然于12月

11日向博古、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在通道会议后和进贵州前,博古在洪州司约见了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根据陈云和李卓然反映的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报告,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另行分配工作。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在以后几天内,协助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他们决定以两天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整编。通过整编,不仅充实了作战部队,也使部队恢复了严整的阵容。12月21日,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圆满完成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使命。

(据新华网)